

「香港完全沒有—

個像樣的食物政策，去為香港人籌劃如何應對食物短缺的危機。」



譚迪詩

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，城市糧食系統研究者。2019年曾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的城市風險實驗室，做剩食的跨學科研究。長期與民間救食團體合作，並成立了網站“breadline”，提供社區剩下的麵包資訊，協助非牟利組織轉介給有需要的人。

text/ 德
photo/ andy

正因如此，對於很多國家來說，糧食是涉及國家安全的 soft security，不是亮刀亮劍那一種，但絕對是嚴陣以待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對策，就是提升自給自足的程度。譚迪詩曾比較與香港面積及城市化規模相約的新加坡，發現後者對於糧食安全非常重視，曾提出要在 2030 年達至 30% 的糧食自給率。「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土地不足，甚至跟中國合作，在吉林省成立比新加坡大兩倍的專屬糧食生產基地，在國內又積極發展水耕。雖然現時他們的蔬菜自給率仍在 10% 左右，但有上升；你看看香港，只得 2%。」

「其實不是新的事情，譬如 1930-50 年代，已經有很多人因為看見原子弹的誕生，而覺得『死啦，我們要儲定整年（糧食）』，因為他們預計，如果大範圍的土地受到核污染，人類至少要在地底生活一年。」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譚迪詩博士說。她是香港少數有志研究糧食安全的學者。

搶贏了 panic buying，之後呢？

只是我們一直受惠於其他地方源源不絕的供應，才有了錯覺，以為香港人「搵食」不難。也令商會的代表會告訴你供應從來沒有問題，但從空空如也的貨架，你就明白城市人心底其實很明白香港的糧食安全（food security）十分脆弱。「就算界你買到又如何，可以捱多久？」譚迪詩詰問道。

「感覺就像只能靠我們個人的能力去對抗世界末日，這不是很崩潰嗎？」

「搶糧」還會造成另一個問題，就是資源分配不均。災難之下，每個人只能夠為自己籌算，顧不得其他人了，甚至因為資源不夠，為了小小一個口罩也可以打起架來。你可想而知，沒有食物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。擴展到國與國之間，甚至可以演化成戰爭。

早前，她在媒體上見到那幾十億的蝗蟲羣正從非洲向亞洲步步進逼，隨時威脅香港人的「米倉」東南亞各國。她那天就跟一起做糧食研究的朋友說：「不行了，我們要自己寫個 food policy 了。」政府不做，民間也要自救，香港人慣了。即使政府不理，至少要提出一種想像。

「災難會考驗一個羣體的韌性，大家能否迅速站起來自救，社區的連繫是很關鍵的。」



糧食，怎樣才是安全？

食物政策是為了保障糧食安全。那不同於食物安全 (food safety)，後者是指食物本身有沒有質量問題，前者卻是一個地方的人民能否得到糧食供應。譚迪詩說，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對「糧食安全」的定義，可分為三個角度。首先是要有足夠的供應 (availability)，第二是民眾能否獲得 (access) 食物的能力，例如他們夠夠錢、有沒有地方，甚至是基建物流是否到位。第三就是能否使用 (use)，例如在發展中國家沒有乾淨食水，香港可能是住家太小，沒有廚房煮食，或者沒有雪櫃儲藏食物，都會影響個人的飲食習慣。

以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來說，use 相對妥善，但 access 與 availability 仍然急須改善。譚迪詩是行動派，常跟不同的民間團體進行「救食」，將社區店舖賣不完的食物，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人。「很多時，是因為資訊不足，需要糧食的人不知道有地方有剩食而 access 不到。」因此，她設計了麵包數據平台 breadline (breadline.hkfoodworks.com)，嘗試收集不同地區麵包店當天剩下的麵包數目，由當區的義工自行收集，送交社福機構，而選擇麵包是因為比較容易存放處理。很多人讚譚迪詩有心、「夠環保」、「搞扶貧」，但她很想大家從多一個角度去理解。「我最貫徹始終的，是關心糧食安全。」

「救食」很有意思，但很被動，像消防員去救火。譚迪詩認同說，其實 breadline 的想法是建立社區的內在架構 (infrastructure)，形成食物資訊的網絡，幫助大家行動，長遠提升社區的抗逆力 (community resilience)。「災難會考驗一個羣體的韌性，大家能否迅速站起來自救，社區的連繫是很關鍵的。」

街市是市區的基建

說到建立城市的內在架構，那是指最基礎的公共設置，如每座大廈的水電供應。譚迪詩指出，街市其實也是一個 social infrastructure，因為居民需要在家附近買到便宜、有營養的新鮮食物，但現在大部分街市卻被私有化。「以前街市多數是食環（食物環境衛生署）管理，但是現在愈來愈多賣給了像領展那些私人發展商。尤其是新區，東涌、將軍澳等等，全都是領展做的，街市租金就比政府的貴很多，也即是說菜價會比較貴，但你往往已經沒有選擇。其次就是超市，但近這幾年，愈開愈多的是比較貴價的超市，草根階層要獲得糧食，是百上加斤。」

當一個地方的基本建設，最終交給了發展商，規劃的能力就進一步被削弱，市民更容易被剝削，安全度也會下降。「有些事情是不能任由市場牽住鼻子走的，街市的租金需要被監管。否則市場的菜價升了幾倍，市民也沒辦法，買𩡻𩷺是不能每日跨區去買的啊。」

至於糧食的 availability，其實是三個條件之中最困難的，涉及到如何改善糧食的自給率，延伸到香港的農業政策、城市規劃——尤其香港對於農業之冷待，其實已經講到口水乾。

譚迪詩覺得可以由民間做的並不多，在城市中做市區苗圃 (community garden) 也是一個可行的想法。「耕作不一定要走到錦田那種鄉郊地帶，一個屋苑其實也可以做到，地方不需要很多，又可以叫居民出來活動。」她說這並非不着邊際，其實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也有人建立超市區苗圃。因為在極端時期，最有保證的就是靠住家附近的田地，可以邊吃邊種。當然香港的人口密度比西方高得多，不可能完全自給，但推動一種自己有能力生產食物的想像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從自給到傳播，譚迪詩覺得可做的工作還有不少。例如在郊區，不少農夫的農作物其實極需要物流散運出去，否則日子一久，農作物就會腐爛。「以我所知，很多農夫其實也不介意捐一些農作物出來，最直接可以接駁的，當然是就近社區的居民。」她有一個學生就投身於這工作，只是力量太小，幫不到什麼，有點沮喪。「溝通和運送的問題，的確要有人願意承擔。過往一直是蔬菜統營處負責，但支援很不足。倒是新一屆區議員可以一想，能否擔當某種角色？」

到底我們幾時會無飯開，還是未知之數；但能力所及，社區有多人多走幾步，好像以前說「加雙筷」，我們或許就能一起多吃一段日子。